

宋代的知识分子政策

□ 方宝璋

右文重儒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很快由一介武夫变为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艺文”的称誉。太宗更以“锐意文史”而见著于史册，面对“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太宗即位后三个月，就举行了第一次贡举，录取名额较多，共得进士及诸科 507 人。朝廷对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等官职；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试，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赴任出发时，每人赐装钱 20 万。对这次贡举，宰相薛居正等认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太宗“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兴文教，抑武事”，正是宋廷右文政策的具体脚注。

太宗时还特别注意从孤寒之家选拔人才。为了避免势家“与孤寒竞进”，朝廷于雍熙二年（985 年）实行别试制度，“令试官亲戚别试者凡九十八人”。这一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许待问，举进士第皆入等，但由于是势家之子而被罢去。为孤寒之家开路，成为宋代科举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为国家选拔才德兼备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都是出身孤寒之家的知识分子。正如明人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记记》中所指出的：“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太学从国子学三馆中分出，单独建校，其入学资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这使太学在宋代成为混杂士庶子弟的普通学校，是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扩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范围。到神宗时期，那些“远方孤寒人士”和“四方士人”没有资格进入国子学的，自然就进入太学学习。熙宁四年（1071 年）十月，立太学三舍法。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人数；然后考试合格者，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这使太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元丰二年（1079 年），太学生总数达 2400 人，到了徽宗崇宁三年（1104 年），太学生总数高达 3800 人。南宋时，国家处于



李公麟《西园雅集》

不同思想的撞击

战乱之中，太学生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较为可观。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六月，时人林同指出：“太学养士千余人”，可见太学仍有学生 1000 多人。

与此同时，宋廷又给太学生以优厚的经济和政治待遇。从经济上看，熙宁五年（1072 年），朝廷规定，外舍生每月发津贴 850 文，内舍生和上舍生每月发津贴 1090 文；元丰三年（1080 年），外、内、上舍生均增至 1100 文；崇宁三年（1104 年），外舍生增至 1240 文，内舍、上舍生增至 1300 文。在政治上，熙宁四年（1071 年）推行三舍法时，朝廷就规定：“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及直讲保明，中书考察，取旨除官。”元丰二年（1079 年），又明确规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崇宁三年（1104 年），废除科举中的州郡发解（乡试）法和礼部试（省试）法，全面实行“舍选”，即“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于是，太学成为全国士庶子弟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主要途径。南宋初年，国子学已不复独立存在，与太学合二而一。

宋代的右文重儒政策，一方面带来了两宋文化的繁荣，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士大夫阶层，并广泛参与赵宋各级政权。这些士大夫有的终身从政，有的在人生中某一时期从政，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以天下为己任，通经术，明吏事，晓法律，重现实，疑经论政，批判现实，著书撰文立说，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阐发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如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朱熹、叶适、吕祖谦等均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据陆游抄录作者不详的《秘史》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由此可见，宋代自宋太祖开始就立下祖宗之法：一是不诛杀士大夫和言事人；二是两宋太祖之后诸位皇帝谨守誓约。

揆诸史事，宋代历朝皇帝的确比较优待知识分子，除非罪大恶极，一般不予诛杀；对上书言事、犯颜直谏之人，一般都较宽容，更不用说加罪处以极刑。如宋仁宗就以“仁恕”著称。有人推荐四川学者龙昌期，说他有才学，仁宗就委以官职。后来又有人指出龙昌期有异端理论，仁宗就免去他的官职，而对他的异端理论不予追究。又如年轻气盛的苏辙曾公开指责他好色，迷恋后官妃嫔，但是仁宗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加罪苏辙，仍任他作为谏官。正由于宋仁宗对臣下、士大夫的宽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富有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的名臣，如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蔡襄、苏轼、苏辙等。欧阳修等还敢公然对儒家经典提出疑问，掀起疑经的浪潮。

宋神宗时期掀起熙宁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在神宗面前唇枪舌剑，互相攻击，但神宗基本上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即使司马光因意见不被采纳提出辞官，神宗仍一再挽留。熙宁变法的论战，各种不同观

点不同思想的撞击，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火花。

南宋孝宗对各种学派也采取宽容的态度。他喜欢苏轼的学说，却没有因而排斥程颐的学说。吕祖谦、叶适、陆九渊、朱熹等学派可以同时并存，说明当时言论环境较为宽松。

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敢于关心现实问题，批判现实问题。如宋初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大力提倡以学习经义和时务为主体的“实学”，要求学生注重时政，不可闭门读书，还要努力精通治民、讲武、理财、堰水等实际技能。王安石作为一名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备的官僚队伍，使天下有了大量的“人才”，“为上行法”时，才能治理好国家。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足以为国家之用，足以有为于世”。所以王安石非常积极地兴办学校，以至多次向朝廷呼吁：“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倡导“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为学要须日用间实下功夫”，“以务实躬行为本”。老师应向学生“教以国体，使之通达政体”，甚至其他经史各项，也应当尽量选取有益于当世之处讲明。他多次抨击当时教育脱离实际，学者空谈性命，学生徒费精力于空虚华靡之学的弊病。

在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中，宋代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陈亮、叶适的重商学派，都关心当时的现实问题，朝政的议论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由此虽然形成了无休止的政党之争，但也由此形成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为学术上的探讨和新学说的产生，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其中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熙宁变法中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论战。

在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中，一向为传统儒家思想所鄙视的重商思想在宋代较为活跃。如一向以正统儒家思想自居的范仲淹、欧阳修等都重视商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南宋的重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亮，把官、民、农、商并列，认为四者的关系是“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其另一代表人物叶适也认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生物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重商思想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空前繁荣影响深刻，在古代经济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有所思

□ 陈家兴

乱世而有群雄并起，但谁为真英雄谁为假主，往往一时真假难辨，唯智者能识。同时，乱世之豪杰，多有“风里落花谁是主”的困惑与感慨，亦往往有风闻雄主而趋奉的传奇。曹操就是这样一位乱世出产的雄主。

不怕不出彩，就怕没出息

最初，曹操之能，“世人未之奇也”。当时许劭和他堂兄许靖搞了一个“月旦评”，根据一些知名人士的所作所为，逐月更改评语和排序。颇有点人才排行榜的味道。曹操去拜访许劭，但许劭看不惯曹操平素的行为，不给评语、闭口不答。曹操于是威胁许劭，许劭便说了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喜而去。估计许劭用的是传统思路，觉得有污点便算不得什么英雄。而曹操用的是革新思维，生于乱世，不怕不出彩，就怕没出息。汉末乱世，曹操之成为奸雄，可谓恰如其分。

曹操之为奸雄，体现在用人上，其雄在能延揽奇才，而终成大业；其奸在不能容才，致使一些贤士殒命。曹操终而只能三分天下，固然有刘备、孙权之英雄当道，但或许也失在其奸，在其堂庑不够大。

公元 190 年，天下豪杰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又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亦多拥戴袁绍。独有济北国相鲍信对曹操说：“夫略不世出，能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乎！”在众拥

袁绍之际，鲍信却能看出曹操之能，盛赞其谋略超群，视其为上天专门派来拯救乱世者，足见鲍信之眼力。

同时鲍信还见袁绍“因权专利，将自生乱”，建议曹操到黄河以南去发展以待时变。亦足见鲍信之远见。后来，黄巾军攻掠兖州，刺史刘岱战死，鲍信等迎接曹操兼任兖州刺史。但在曹操与黄巾军的战斗中，鲍信不幸战死。鲍信可谓曹操的第一位伯乐与坚定支持者。曹操悬赏寻找他的尸体而不得，便刻了一个鲍信の木像，下葬时曹操亲去祭奠，放声大哭。于曹操言，不仅是痛失人才，亦是憾失一知音。

纷乱之际，多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故事。如庸主之袁绍，其下虽众，却多庸才，或有贤才而不能善听善用。如雄主初起之曹操，其众虽寡，却渐聚英才。所以雄主能成事，就在其本身能吸引人才来附聚。

荀彧投奔韩馥时，袁绍已经夺取韩的地位，用上宾之礼待荀彧。但荀彧看不上袁绍，认为他“终不能定大业”，“闻曹操有雄略，乃去绍从操”。这表明，雄才大略者，本身就是延揽

人才的名片。而庸碌之輩虽居高位，仍然会被贤才看不起。而曹操和荀彧面谈后，高兴地说：“吾子房也！”任命他为奋武司马。把荀彧比作张良，足见其器重，而荀彧也堪当其重。然而，到头来，荀彧被曹操逼而自杀，亦见曹操之奸。

多宽有背叛自己的人

曹操先东征袁术，在破袁术后，即延聘陈国人何夔为僚属。何问对袁术看法后，曹操说道：“为国失贤则亡，君不为术所用，亡，不亦宜乎！”这表明，此时的曹操，已经把人才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了，这显然是治国立国的思维。当时，曹操性情严厉，部属因公事往往会受杖责，何夔便随时带毒药，“誓死不辱”，但最终也没有受过曹操责打。这说明，曹操懂得尊重人才。有的人才皮实，有的人才则脸皮薄，对不同人才用不同办法，才会笼络人才。其后，沛国人许褚率众来归，曹操高兴地说：“此吾樊哙也！”即任命他为都尉。

此时的曹操，对人才的吸附能力，可谓方兴未艾。他在用人的心胸气量上也今非昔比，对那些背叛自己

的人，亦能多宽宥之。擒获吕布、陈宫后，虽绞杀了他们，但赡养陈宫之母、嫁其女、抚养其家属，比当初陈宫跟随自己时还要丰厚。吕布军中还有前任尚书令陈纪与其子陈群，曹操皆礼用之。张辽率众归降，亦被任命为中郎将。徐禽、毛暉都是其部下将领，兖州大乱时皆背叛曹操，但仍将两人用为太守。这等用人的肚量，于曹操可谓极一时之盛，也正因此能使各类人才，无论有私仇公怨前嫌，无论亲疏贵贱，仅以贤能为唯一标准，皆能为我所用。

袁绍消灭公孙瓒后，更加骄横，准备攻打许都，双方驻守官渡。袁绍去拉拢张绣，张绣谋士贾诩说了三条投奔曹操的理由，第三条即看重的是曹操的气度：“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对于此时的曹操来说，可谓一语中的。曹操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

袁曹之争进入关键阶段，在相当意义上说，这一战，乃是双方一善纳建言、一刚愎自用的见证。双方相持半年，曹操欲退回许都而致信荀彧，荀彧回信“情见势竭，必将有变”，建议坚持持之；袁绍幕下许攸投奔曹操献计，终焚袁绍粮重。至此，曹操

根据远古的传说，中国的文明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但是，上古之事，遥远而不可征，有载而不可稽。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得不以非常谨慎的态度以五帝开篇叙述古代中国的历史。在五帝之后的夏商周三代中，夏的存在已无多大争议，但对夏的历史，在许多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尚书》中的《甘誓》篇，是学界普遍认同的反映夏代情况的文献。

《尚书》的《甘誓》篇并见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夏本纪》，大部分文字完全相同。《尚书·甘誓》记载了夏王启讨伐有扈氏的历史事件，其内容为夏王启讨伐有扈氏时，在甘（今陕西西乡县南）面对六军主将发布的临战誓词。夏王启在宣布有扈氏罪行时说：“有扈氏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句话的大意是：有扈氏轻慢五星天象，怠慢遗弃大臣，上天要断绝他的生命，现在我只有一奉行上天对他的惩罚。誓词中又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这句话的大意是：（夏王启说）在战斗中服从命令、奋勇杀敌者，将在祖先神主前受到奖赏；不服从命令、临阵脱逃者，将在社神神主前予以惩罚。

以上两句话，在《尚书》和《史记》两书中文字完全相同，可信度很高。夏王启是夏王朝的第一个王，上述内容反映了四五千年前夏初的有关情况，透露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信息。第一，这场战争，是两个族群之间的斗争，不然，启不可能以祖先的名义实施惩罚。第二，对外以天神名义进行讨伐。第三，对内以祖先和神的名义实施奖惩。其中的祖和社，是指祖先和社神的牌位，社神就是土地神。夏王启出征，就用车子拉着这两个牌位，将奖惩归之于祖先和神的意志，以示非己自专。而土地则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赖以存在的条件。如果结合至少在战国之前即已广为流布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事见《论语·泰伯》《孟子·滕文公》《庄子·天下》《国语·周语》等），似可推断早在夏代，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即是农业。理由是，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的，并不需要治水。第

四，纯用武力而不用德教，这反映了人类早期文明的特点。在群居动物中，动物之王是完全通过武力的争斗而产生的，人类越洪荒、越野蛮，就离动物的特性越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夏初，天神、社神和祖先崇拜即已出现。崇拜祖先，孝在其中；服从王命，忠在其中。

中华春秋

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擅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这一评价，深刻指明为雄主者，骄不可纵，胜不可骄。一骄则易自负，看不到危险处。更易自得，听不进人才的良言。

公元 212 年，曹操率军东征孙权。此前，董昭和其他人商议认为，曹操应当封爵为国公，加九锡。荀彧表示反对。曹操很不高兴，到东征孙权时，便让荀彧到谯县来慰问军队，而借机留下他。后荀彧服毒而死。时人皆惜之。

司马光就此写过一段很长的“臣光曰”，对荀彧的评价甚高。这一大段议论，以示荀彧的才华仁德与气节非同常人，亦是对此千古贤才逝去的追憾，于曹操言则是有愧于追随自己而立大功者。其所以为奸雄，乃因其奸而不欲他人阻其奸道也，必以挡我者死，顺我者生。

在公元 214 年，荀彧的侄子荀攸，时任魏尚书令去世。与荀彧相比，荀攸深觉而明智，善于保护自己。一门两贤才，可谓为曹操的大业立下大功劳。曹操曾称赞说：荀彧进献好的建议，不被采纳不罢休；荀攸劝谏错误的行为，不达目的不停止。又说：荀彧和荀攸两位尚书令，对人物的评论，时间愈久，愈显出他们的观点中肯，我终生都不会忘却。这说明曹操深知贤才，然而存在不能容纳人才的若干死角，这是曹操一大败笔。

选人用人史话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昔齐桓一